

【论 文】

青海民国史研究的进入、定位和难题

菅志翔

青海位于我国西北，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东邻秦陇，西接西藏和新疆，南连四川和西藏，面积 72.23 万平方公里。青海东部的部分地区属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河谷地区适宜农作，面积 3.46 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4.8%；中西南部地属青藏高原，适于牧业，草原总面积 36.45 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50.5%（青海省统计局，1997：4）。我国中部农业经济和西部牧业经济的交汇地带的北端就在青海省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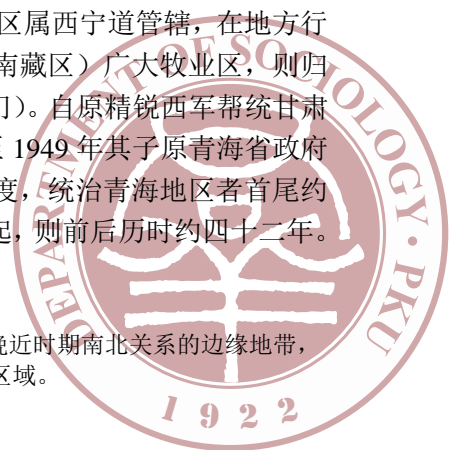
同时，青海也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数千年来，多种文化状态并存，相互熏染，使青海地区文化呈现出一种交汇多元的特点。我国北方聚居的蒙古族、青藏高原聚居的藏族，连续散布于东部黄土高原的“回回”穆斯林各民族、以及聚居在三大高原的过渡地带的其它少数民族，都是构成这种多元性的组成部分。2000 年，青海省总人口 4,822,963 人，其中，汉族 2,606,050 人，蒙古族 86,301 人，回族 573,378 人，藏族 1,086,592 人，土族 187,562 人，撒拉族 87,043 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46%（国家统计局、国家民委，2003：4-27）。

由于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位置，青海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王明柯在其新著《游牧者的抉择》（2008）一书中关于高原游牧文化的分析就以这一地区为重点。而他之所以将重点放在河湟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地区在“汉帝国”形成的过程中始终都卷入了“帝国”政治，在汉文历史文献中有丰富的记载可以引用¹。

但是青海毕竟地处边远的西部，在整个中华文明和政治的中心转向沿海地区的近现代发展进程中，青海成了中华体系中位于边缘的一个小地方。说它小，并不是指它的面积和人口，而是就其被关注到的社会历史影响而言。通读本中国近现代历史著作，无论是中华圈的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几乎都没有提到这个地方（费正清、费维恺，1993；谢和耐，2006；徐中约，2008）。青海之所以会以一定分量出现在中共党史中，则是因为青海是构成“西路军问题”的不可避免的重要单元。

虽然青海作为一个地方有着古老的传统和政治影响，但它一直处于诸多文化和势力的交汇或边缘地带，作为一个体系中的相对独立的构成部分并在体系中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却始于现代，迄今只有约 100 年的历史。青海于民国十八年即 1929 年正式建省。民国的地方行政体系在青海建省以后，才开始缓慢地向全省各地推进。“青海在未建省前，今海东地区属西宁道管辖，在地方行政建制上归甘肃省。今湟源县日月山以西及青海南部（当时还包括甘南藏区）广大牧业区，则归青海办事长官公署管辖（原为清代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衙门）。自原精锐西军帮统甘肃临夏人马麒（字阁臣）于 1912 年（民国元年）任西宁镇总兵起，直至 1949 年其子原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乘飞机逃走，马氏家族以封建的兄终弟及或父子相承的制度，统治青海地区者首尾约三十七年。若就马麒于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任循化营参将时算起，则前后历时约四十二年。故时下一般概计为四十年”（李文实，1986：118）。

¹ 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来看，青海既是远古时期大陆东西关系的边缘地带，又是晚近时期南北关系的边缘地带，不论在哪种关系视野中，这个边缘地带都是说明各种互构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理想区域。



由于自建省以后，一直到中华民国结束其在大陆的历史为至，青海几乎完全由马氏地方军阀所控制。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谈及民国时期的青海的时候，几乎是不约而同，都将注意力集中于“马步芳家族的统治”（陈秉渊，[1986]2007；杨效平，1986；吴忠礼、刘钦斌，1993；崔红、张得祖、杜常顺，1999；许宪隆，2001；等等）。从现有的青海民国历史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对于这样一个具体的地方的具体时段的历史，人们有意无意间分别以某种方式结合了国家标准历史叙述和“英雄史诗”两种处理历史的方法，以国家的标准历史话语处理了在这种历史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人物，同时，在注意到这些人物的同时又忽略了其他。表面上呈现的是除了这些历史的“恶人”或者“罪人”之外，他人与这种历史无涉，内底里展示的历史逻辑又是“英雄主义”的。因此，即使冠以“青海”二字，这些关于青海的历史叙述依然是“国家史”，而非“地方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和“为了”“青海”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以外的 something（什么）的历史。

一、青海民国史的进入

青海从其“古代”，到今天的“现代”，中间经历了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大致起于辛亥革命以后，止于共和国地方政体牢固建立和地方治安归于平静，历时半个世纪。虽然涉及的具体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前后大概都有十年左右的出入，一般仍将这个转折时期冠之以“民国”的时间概念，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青海民国史”。

青海民国史的研究首先是地方史的研究，至少要求进入当地的具体情境，以当地为中心，或者以当地人的视角为出发点，来看发生在当地或对当地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而当我们注意到青海地方的族群历史和文化多样性之后，“当地”和“当地人”都需要经过分析才能确认具体所指。因为在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具有多样性的人们在这样的具体时空中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的情况下，区分具体的地点、行动者等，恰恰是我们进入“历史田野”的前提。

即使仅仅是在准备举步迈向这片“历史田野”的时候，研究者随时都会意识到，人们关于这个地方的“民国时期”的历史记忆，已经深刻地打上了继之而来的“共和国时期”的历史话语和社会选择的烙印。一方面，国家话语主导甚至淹没了人们对于地方历史的记忆，也主导了人们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理解；另一方面，在青海当地是谁在叙说着历史，又是近 60 年来共和国历程中社会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力在今天还不时作用于进行历史叙述的人们身上。因此，即使是在当地，倾听历史的叙述，也要注意至今人的记忆与当年人们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异。进入青海民国史，不仅仅是要进入到这个地方社会，而且要回溯到它的过去。只有进入了与研究对象对应的历史时空，对“青海民国史”的分析才有可能名副其实。

那么，如何才能满足上列基本要求，进入那块“历史田野”呢？

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在方法论层次上检讨有关青海的历史研究，不仅揭示出我们不可能抛开前人另辟蹊径，因为他们的历史叙述体现着当代有关那个时代的“青海”地方的历史叙述的主流话语，并且已经经由各种途径渗透到普通人们关于历史和自身的认识中；而且要求我们深入了解前辈学者之可为与不可为，理解和思考他们的隐忧和难题，通过研究他们的研究把握当代历史制作的方式，提出新的问题，继续推进。

青海地方的历史在国家的宏大历史叙述中隐没为“马步芳的残暴统治和一心反共”这一政治定论中，而这个问题恰恰也提示着青海民国史研究可以在学术上有所突破的方向，那就是为什么马步芳家族可以独据青海并维持其统治达 40 年之久？究竟是什么力量最后把“马步芳”推上了这样的“历史审判台”？

已故的李文实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得意门生。他在解放以后经王震将军“钦点”，得以进入青海地方高校执教，是青海公认的地方史权威。在 1986 年所著的文章《马氏家族长期统

治青海的原因试测》中，他从历史背景、地理背景和人才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以下笔者借用李文实先生的思路来探讨进入青海民国史的可能路径。

（一）“青海民国史”的历史背景

李文实先生的文章在讲到“马氏家族兴起的历史背景”时，提到了三点。

一是马氏先祖马海晏反清和携子（即马麒）两卫京师。这一点为我们提示的线索主要有三：

其一，晚清西北动荡，主因在于当地的回民，而西北稳定，也是由于河州地区回民上层精英降清并忠心效命于朝廷。河州回民上层因效力朝廷获得信任，在清末形成了强大的军事集团，称“精锐西军”¹，马步芳祖父即为中坚一员。直至青海建省，马氏父子稳握省政，西北治乱一直与这支武装力量的动向息息相关。这是在研究西北地区社会历史问题是必须涉及的重要背景之一，而为何回民在青藏走廊的西北端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

其二，“西军”既然出自河州，对于青海地区而言，马氏家族的势力就是一股“外来”的力量。马氏家族如何进入青海，如何在这一地区培育根基并站稳了脚跟，又如何与当地各类群体相处中处理和表述他们的“外人”身份，这些都是今人了解青海民国史所必须面对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对应的另一面向，就是青海地方各种群体又是如何看待这样一群“外来者”，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这个外来者的身份很特殊，第一，它并不遥远，而是紧邻；第二，与其他族群相比，它实际上一样位于边缘。因此，它统治地方的正统性往往受到挑战

其三，马氏先祖两卫京师，在清朝末期，一方面使得这个家族获得军功，在朝廷的政治舞台上有一些资本；另一方面，由于护卫京师所针对的是八国联军，这一“抵御外夷”的军功又为其政治地位又提供了一种“永久”的超越朝代和国体更替的支撑。马家祖上抗御“洋鬼子”的军功，与张元所研究的嘉绒藏族在性质上有极为相似的地方。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演绎出不同的社会资源，前者以此为踏板进入地方权力争夺，并发展成为一支较具实力的地方武装，而后者只是在地方场域中提升群体以及象征群体的山神的地位，以此为资源参与地方互动。而为何会出现这样两种历史演绎逻辑，可能是我们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的关键点。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马氏一族虽出自边缘，但他们的政治历程中涉及了世界局势和国家安危，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世界眼光”。

二是“英帝侵略与青藏问题”。西藏问题直接起因于英国的势力扩张，并将青、康、甘、滇也牵涉其中。马步芳父子据青海，与西藏问题有直接关系。西姆拉议事之时，马麒由“西宁镇总兵改任甘边宁海镇守使，他以洞察英帝阴谋与野心的敏锐眼光，致电北洋政府据理力争，并通电全国表示反对‘西姆拉议事’（包括藏方在英国支持下提出的条文如划分内外藏并对内外藏分别实行不同的行政管治方式、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笔者加注）。马麒的这种态度，引起川、滇当局和全国上下一致响应，（使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会议文件上签字），使英帝和西藏部分亲英上层分子的阴谋未能得逞。马麒的所以能久于其任，和这桩震动全国的大事，有极其重要的关系”（李文实，1986：120）。而马步芳继续主政青海，除受其父荫庇之外，在这方面也有他自己的作为。“在青藏问题上，在马步芳时代又有1931年和1943年两次青藏事件。前一次藏兵从西康进入玉树，被青、康两方面驻军所逐出；后一次正当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态势十分严峻，而西藏亲英分子陈兵黑河，蠢蠢欲犯青海，经马步芳奉命派骑兵一旅（另加马英的骑兵团）急援，才把局面稳定下来。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险恶，中、英虽属同盟，但背景极其复杂”（李文实，1986：120）。

马麒发“艳电”，处置“西姆拉”之争，正置北洋袁世凯当政，军阀买办卖国争强，政府分立，边疆事务危机四伏，中央政府力不从心、鞭长莫及。当此之时，他的这一行动对于乱局之中稳定边疆贡献不可小视。而马步芳处置青藏问题，也正值抗日战争期间，中央政府举全国之力东拒日

¹ 回族深度卷入中华帝国政治，并从边缘走向中心，在清帝国末年是一个需要专门加以研究的问题。而这样的“出身”，又赋予其显著的政治特点，应从其行为中观察这种特点



寇而无暇西顾之时。“与此相联系的，还有马步芳部骑五军开赴新疆的举措，这都可以说是与当时国内、国际局势息息相关的。马步芳本是一支地方势力，非国民党军的嫡系，但蒋介石所以不能不利用他，则是当时历史形势所造成的”（李文实，1986：120）。马家派骑五军入新，与尧乐博士、麦斯伍德、乌斯曼等人都建立密切关系（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2001：44-48），对1945年“三区革命”爆发以后新疆局势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历史事件都提示我们去注意这样一个地方军阀集团的认同倾向、自我定位、政治立场及其在国家政局中主动或被动承担的功能角色。这种思考又必然会引导我们注意，这个集团是究竟如何获得这种特征的，以及在同一时局中，除马步芳和青海地方当局以外的其他各个方面的态度、取舍和举措。对于这些问题，必须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加以理解。而仅仅从象征-实践角度来看，只能得其表象，而非实质。

李文实先生提到的第三点是“迎降国民军”。李文实先生所强调的是，在冯玉祥率领西北军进驻西北甘青地区时，马麒的审时度势、顺应时局。民国初期，西北回民军阀势力强大，青、宁建省以前，甘肃八镇中“西军”据有其四。但是，“顺时者昌、逆天者亡”，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的青海马麒和宁夏马福祥在乱局中把握住方向，保住了自己的势力。在青海地方势力的作用方面，这一点给予我们的启示，略同于青马在新、藏问题上的表现。而当我们站在青海地方的立场上来看“国民军进青”这个历史事件，就会发现，国民军一方面促进了青海省政建设，实现了马麒在青海奋斗多年的夙愿，另一方面又强化了马麒统治青海省政的社会基础，从当时青海流行的一句民谣中可以得到证实：“宁叫土匪勒索死，不叫国民军刮死”。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家强力机器、地方势力与社会的关系。顺着这条思路，我们可以深入了解青海地方社会在民国时期的处境，从中理解各方在民国时期的行为和相互关系。但是，马步芳最后却在解放前夕，不识时务，逆势而动，以卵击石，落得惨败，这也是李文实先生所强调的历史教训。

（二）地理因素的引入

李文实先生认为，“马氏家族的兴起，……也是甘肃这个地区（特别是河湟流域）特殊的地理条件所促成”（李文实，1986：112）。地理条件决定一个地区特殊的人文、经济和政治面貌，李文实先生从“马氏家族的祖籍在今甘肃临夏膜尼沟和积石山的乱藏地方”、“西北地区在最近数十年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势，也是马氏家族得以盘局的地理因素”三个方面分析马氏家族在青海的“地利”。以下我们来逐一讨论李文实先生所列之“地理因素”。

1. 河州，即今甘肃临夏地区。王明柯在分析高原游牧社会的群体关系和政治互动模式时指出，河湟地区的部落纷争和社会动荡总是由出自其右的与中原王朝有着紧密关系的地方强势力量来平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近代以来，甚至可以包括马步芳家族的军阀势力在内（王明柯，2008）。河州正是紧邻河湟地区的“熟番”和“汉民”杂居之地。这里的人们既已习得华夏帝国的文化、政治规则，又仍保持着强悍的民性和娴熟的弓马骑射。当地复杂的族群结构、宗教派别关系也使得人们具有相当高超的社会政治能力。实际上，自古以来，青海地区就与帝国政治有着密切联系，是构成帝国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这种联系又往往是经由陇南势力达成和强化的。马步芳家族正出于此地。因此，帝国或民族-国家体系介入青海地方的角度，也是我们进入青海地方民国史的路径之一。

2. 青海利于割据的地理条件。“清末民初，由于帝国主义分割势力范围，各地军阀得以分片割据，而西北地区由于偏处边陲，交通梗塞，非中原争全局者所注重，因而地方势力，易于盘踞。……马步芳生前曾说过：‘我们坐在番子窝窝里，为人家所不重’。也就道出了这个形势特点”（李文实，1986：122）。因地形、交通因素而利于割据，实际上与紧邻强势的介入并主导，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当地势力为何不得成割据局面？这里讨论的实际上是自游牧文化兴起以来亘古未变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力，把我们带回到王明柯讨论的问题中。而这种影响力在近现代，也就是在民国时期如何发挥作用，是我们理解青海历史中“古代”与“现代”的衔接过程的关键点之一。



3. 政治地理形势。“青海建省，其偏处西北一隅的地理位置，有所改易，但又以藏事纷扰，红军西征，以迄日寇入侵等形势的发展，马氏家族又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依靠力量，因为这时马氏家族的政治军事力量，已在本地区形成举足轻重之势了。……北伐战争，使当代北方、南方军阀趋于瓦解；抗日战争，又使西南地区军阀势力，归于分崩离析，而唯独西北两个马氏家族势力，反而扩大，这也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东面既不当日寇的西侵，而西北与西南，又适为外人所觊觎，便益增重其坐镇的地位。青新、青藏公路的建修，便为我们透露了这个隐秘的消息”（李文实，1986：123）。李文实先生在这里指出的是，由于青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当诸多全国性的大事件的影响力到达青海时，对当地的影响被纳入地方系统的轨道，转化为于地方有利的“时机”。如果从青海当地的视角来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我们甚至可以窥见“外力”是如何使青海以其特有的方式“顺应”历史并把握自主性的。

4. 回民。河州地区的伊斯兰化是在元末，既有丝路商道的作用，也有帝国政治的影响。争夺帝位失败的阿难达旧部就驻在河州，为压制该部，元廷还派来几个亲王坐镇于四周，也包括河湟地区。在河州，除了聚居东乡的阿难达旧部（为今天“东乡族”的主体）之外，几乎全部使用汉语，遵习汉俗，只是对日常生活的“解释”依据经人们选择过了的伊斯兰教理。来源与意义系统的差异，使得河州的“回回”虽貌同汉民，但却被视为“陌生人”，处于紧邻于“汉”甚至就生活在其中间的“边缘人”。这种处境下的回回，反而发展出一套兼融汉番的生存技能，成为“汉”与距离中心更为遥远的“番”之间的链接和润滑，在中华系统中居于一种极为特殊的位置。这种位置中的人们获得的“地方性知识”是中华帝国处理西北以及整个边疆事务的宝贵政治资源。从长远的历史过程来看，近世以来“回回”的作用与史家所分析的“陇东”、“陇南”集团相类似。差异在于，除具有“陇东”、“陇南”集团的要素之外，“回回”社会中还实践一套来自于更加遥远的“西方”的意义系统，带入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以外的更加复杂的“世界”历史因素。可以说，“回”的特殊性恰恰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中华帝国体系多重“系统连接”的重要窗口。这种“连接”分布的一个重要方向即在青海。

5. 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势。“甘肃、青海南部，为安多藏族聚居地，河南蒙旗也杂处在那里，马氏先世因从事牧区贸易，多与当地千百户和喇嘛往来，到马麒时代，更与甘南拉扑楞寺活佛嘉木样四世、贡唐仓；河南亲王、黄南红教活佛古浪仓等，均建立有一定的往来关系。虽在他们父子两代，对拉扑楞、果洛、玉树及黄南等藏族部落，进行过镇压，但同时又对阿坝的杨俊扎西（原果洛莫巴人）；海北的华宝藏（刚察千户）、同去乎（达如玉千户）；海南的丹德尔（拉加寺管家）、朝日加（鲁仓千户）；黄南的夏日仓（隆务寺活佛）、札西（隆务昂口）；玉树的札武久美；河南蒙旗九世亲王贡噶环觉、十世亲王札西才让，海西札萨齐木贡旺札勒拉卜旦（齐雨民）及塔尔寺活佛阿嘉等，均委以事权，进行拢络。而化隆、民和、门源、大通的回族；化隆、循化的撒拉族，则又以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关系，更为马氏家族所倚重。马家军骑兵所以称雄一时，难与争锋，都与这些少数民族精于骑射，熟悉地理，善用地物为掩护，而且射击准确等条件有关。……而甘肃、青海两省，又是历来养马重地，浩门马、河曲马，到现在犹称龙驹。马家军骑兵的所以突出，正可以具体说明它得地之利。在过去时代来说，这个条件也是本地区所特有的”（李文实，1986：123-4）。从李文实先生文中至少可以看到一点迹象，那就是多族群杂处的复杂局面在民国时期的青海，在一定意义上被转化为构成地方优势的重要因素，这与青海周边的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照。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和处事原则是什么？这些问题将引导我们探讨复杂的青海地方社会内部关系结构。

青海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一直以来都以整体形式发挥着影响。在对李文实先生文章的分析 and 引申中可见，地理因素的引入，提示我们需要在足够深广的历史脉络中研究一个具体时空，在历史的“上下文”中理解人的行为和意识、事件的机制和意义。

（三）谁是“青海民国史”中的行动者



在分析了历史背景和地理因素之后，李文实先生以很小的篇幅指出“马氏家族的兴衰与人才的关系”（李文实，1986：124）。在大半页、不到600字的篇幅里，李文实先生实际上谈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没有明说，但却十分关键，那就是，马氏祖孙三代，都有过人之处，是难得的人才。第二点，李文实先生提到马氏先祖与“一般群众的关系”：“据说马海晏出身寒素，‘慷慨好义，乐善好施’，甚至还说他有‘人饥己饥，人忧己忧’的风范（均见高文远¹著《清末回民之反清运动》所引）。这虽不免溢美，但可略窥其与一般群众的关系。”第三点，李文实先生谈到在世事多桀、群雄争霸的几十年中，马氏能立于青海，“其主要原因当在于马氏先世有过人的胆略与见识，而且虚怀若谷，用人唯贤。这就是他们与群雄角逐中获胜并能为其后人创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的关键所在。”这句话还提示我们注意到马氏统治青海的“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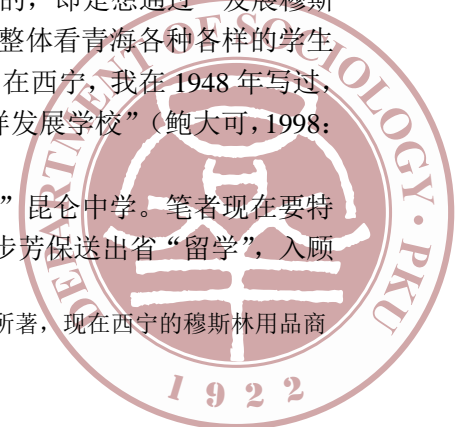
李文实先生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寥寥数笔，直逼问题的要害——人。实际上，人才是历史的主体，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中的行动者。李文实先生的几百字，已经指出，青海的民国史，不仅仅只是马氏家族表演的一段历史，参与其中的行动者还大有人在，不仅包括了“一般群众”，甚至还拥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但是，李文实先生只点到了为马麒重用也一力赞襄马麒的青海名士，对于“马步芳时代”，则指其“虽自诩为局面大过先人，但他不识时务，狂妄自大，而用人尤滥，不是聚敛之臣，就是献媚之辈。对国民党阳奉阴违，对共产党一意为敌，即使在全国解放前夕，形势已危如累卵，而他还妄图残民以逞。其彻底败亡，虽由当时举国解放潮流所使然，但马步芳的昧于时势，倒行逆施，不仅使他的祖先所辛苦经营的基业，隳于一旦，且使青海广大人民备受苦难，这是当代全国各地所有军阀中所鲜见的！”似乎，马步芳除了暴虐逆施之外无甚建树。这与李文实先生在此一部分一开始所作的论述有些矛盾。李文实先生写道：“同样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但和马氏家族争夺统治权的人，如马国良、马廷勳、马仲英、陆洪涛、孙殿英、于学忠、黄正清以迄马鸿逵，他们的实力与条件，虽大都与马氏家族相当或有所超过，但都未能取而代之”。李文实先生所点到的八个人中，与马步芳相争的至少有马仲英、孙殿英、黄正清和马鸿逵，而马廷勳、马廷贤兄弟也一直是马步芳的强劲敌手——八人中的一大半都是马步芳主持局面、独立应对的。如果马步芳只是如李文实先生所述一味逞强，用人无道，他在虎狼之争中无论如何也不会立于不败之地。

倒是民国时期的观察家指出了一些马步芳的特点：“马麟的活动是侧重消极的、个人的、保守的、家庭的。马步芳的活动则比较趋向积极的、团体的、进取的、社会的。所以，研究马步芳的政治作业，对于西北的将来，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范长江，1937：145）。马步芳的“积极的、团体的、进取的、社会的”活动特征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鲍大可在1948年的旅行中，对青海用了两次“印象最为深刻”。一次他提到：“尽管马的政权是严厉的、完全的权力主义，但是由于部队的纪律和素质以及政府的目标瞄准了经济的发展，这就使青海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同于其他军阀政权，诸如宁夏的马鸿逵和山西的阎锡山。在40年代末，这些政权都带有极端的权力主义色彩，而很少有改革创新的特点”（鲍大可，1998：254）。另一个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昆仑中学。“马步芳因为支持了一种特殊体制的昆仑中学而非常出名，但昆仑中学几乎有90%的学生是回族穆斯林，教阿拉伯语。马表述过其教学目的，即是想通过‘发展穆斯林教育的水平’来产生新的穆斯林的杰出人物。尽管在当时作为一个整体看青海各种各样的学生总数仍就是小的（也许刚超过人口的10%多一点），这些学生主要集中在西宁，我在1948年写过，这个学校体制是省里最有影响的发展，因为西北其他的军阀没有像这样发展学校”（鲍大可，1998：298）。

这里甚至提到了马步芳的“改革创新”和“省里最有影响的发展”昆仑中学。笔者现在要特别说明的是，李文实先生正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并被马步芳保送出省“留学”，入顾

¹ 高文远曾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之前就读于昆仑中学。此书是他逃往台湾以后所著，现在西宁的穆斯林用品商店里可以买到。



颀刚门下深造。他本人与马步芳的亲信之一马振武是密友，与马步芳的独子马继援也是好友。作为青海民国史的亲历者，李文实先生对这个时期的分析和评论，挂漏行止，韵味独具。而一个经由昆仑中学的培养和保送才有可能最终成才的学者，不论有意无意、主动被动，在他的文章中对母校只字未提，似乎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暗示着我们研究青海民国史的路径¹。在一个方向上，我们需要探讨人们在经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之后的历史记忆和表达方式；在另一个方向上，关于那个时代，昆仑中学可能是我们进入人的世界的幽径。

昆仑中学的前身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附设第一中学”（简称“回中”），始建于1933年2月，初建时只有初中一、二年级两个班。1936年增设高中部，更名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立高级中学”。1942年，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到青海视察，根据学校的发展情况，白认为校名过于冗长，而且简称“回中”显得门槛过于狭隘，与学校招收各族学生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²，建议更名。马步芳在属僚中征求拟名，最后采用薛文波（回族，时任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书记长）的意见，定名“昆仑中学”。

马步芳从1937年起自任该校校长，自第二年春节开始，经常亲自到校巡察，凡有青年要求入学，莫不允准其请。学校的经费由马步芳旗下的德兴海商号供给，在校学生全部公费，并统一供应服装、住宿伙食和书本笔墨纸张。昆仑中学的课程，完全依照教育部规定的要求开设，教材也采用商务、中华（等出版机构）经教育部审定的课本，学制也同于国内一般六年制普通中学，区别在于每周加设两次四课时要求穆斯林学生必修的阿拉伯语文，校内建有礼拜堂，主麻日周五休息。学生毕业以后由省政府统一分配工作，或保送外地继续深造。昆仑中学建有一整套完整的教育系统，附设有幼稚园、多所小学以及完全制中学，并根据青海省的需要设有各种专业人员培训班、党政干部培训班和军官培训班。1949年，昆仑中学系统的在校学生总数达到8000多人。昆仑中学也是马步芳的独生子和继承人马继援就读的学校，马步芳凭借举办教育的机会笼络了一大批青壮年后备军，并为其子奠定了青海新生代少壮派核心人物的地位。在马步芳时代，青海党政军要员多数出自昆仑中学。不难看出，昆仑中学实际上是马步芳培养为己所用的各种人才的基地，也是马家统治青海的一块基石。

以昆仑中学为切入点研究青海民国史中的人，具有其明显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作为马步芳时代青海社会精英再生产机构，围绕昆仑中学的一切都与人有关：是谁为了什么目的把哪些人培养成了什么人？这些被培养出来的人进入社会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对什么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什么人被接纳？什么人被排斥？……

第二，昆仑中学可以让我们在活着的人们的亲身经历和历史思考中寻找历史的“真实”。昆仑中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学生马继援现在还在世，当年围绕在他左右的少年才俊现在还有一些散落各地。昆仑中学精心培育的一批幼苗在他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有幸迎来了新社会，成为共和国时期青海历史的积极参与者。这些健在的昆仑中学的学生，是历史中的行动者，可以为我们提供那段历史的主位视角。他们也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纽带，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历史的本来面貌，对历史为何呈现出今天的面貌理解更多。

第三，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昆仑中学与民国时期青海所有的社会部门之间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内在联系，也与青海各地和各族群的内部进程密切相关。其他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它这样

¹ 李文实先生在三年之后著文“昆仑中学抚今追昔”，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宁市委员会编《西宁文史资料》第六辑第41-47页（内部资料）。

² 有关白崇禧这次视察情况的记录反映，在白所到的几个教学班中，穆斯林学生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其他族群出身的学生占多数（马宣道，1984）。笔者对1946年以后进入昆仑中学读高中的老人的访谈资料，也显示相同的族群比例。



的功能。昆仑中学实际上是民国时期青海社会历史系统的结构中枢，通过与之相涉的各种关联，我们可以探索青海地方乃至卷入其中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内在结构的历史变迁。

从昆仑中学我们还可以探讨，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普遍进程中，马步芳治下的13年不同于他的父辈，是青海地方社会内部逻辑转变的过程。马步芳成功地找到了掌控这个过程的门径。循着这个门径，今天的我们可以找到当年马步芳撬动青海社会历史的支点，进入那个时代的广阔历史田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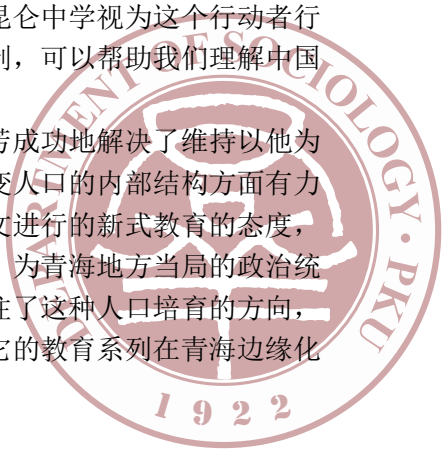
二、青海民国史的定位

梳理一位以自己的生命史“进出”青海民国史的学者写于二十多年前的文章，为我们呈现出了一部“多重纠结”的地方史。回归到青海地方的历史脉络中，民国时期是一段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在民国时期青海地方上演的历史剧中，“承上”和“继往”的主角是马麒，“启下”和“开来”的领导者是他的儿子马步芳。马麒所承何上、所继何往，指向的是中华帝国体系既有的道德—法权规则体系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中心—地方—群体关系，他的习得的行为方式、政治资本、统治合法性和社会认同的基础都来源于此。而他的继承者马步芳，“启下”和“开来”所指向的目标，在那个时代，除了他自己的野心、志趣和偏好之外，我们几乎可以从马步芳本人的言行和他所刻意经营的“团体”的作为和意识形态表达来观察。

马步芳自国民军进青开始组织训练“新军”，一直致力于青海地方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到解放战争时，他胆敢命自己的儿子马继援恶战陇东、负隅顽抗，凭借的就是手中这支完全听命于他并被赋予某种“使命感”的军队。为培育青海地方的武装力量、行政管理 and 经济活动方面的人才，马步芳极为重视昆仑中学，不仅令其完成一般普通学校的教育任务，而且也将其用作自己的干部培训基地，从1936年开始系统培训了包括保、甲长在内的青海地方的党、政、军干部，为其在青海进一步建政设治打下人力资源的基础。昆仑中学同时还承担了为青海地方培养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马步芳通过这种方式基本上实现了“人才自给”，从而有效地“婉拒”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渗透”。马步芳继承父志，大力推行了所谓“六大中心工作”，即编组保甲、训练壮丁、积极造林、修筑公路、厉行禁烟和推广识字，曾一度使青海地方面貌一新，堪称“西北楷模”。在发展、壮大青海地方势力的同时，马步芳处处以青海当地人才的发展为依托，举措谨慎，步步为营，以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经济形势失控，金融糜烂的形势下，依然能够自固一方。在马步芳治下的13年中，青海社会缓慢但却以加速度启动了它的“现代化”进程，民风在改变，社会流动的机制在变化，政治、经济运作的方式也应和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节奏而变化。这些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视为马步芳推进地方现代化和将青海紧密纳入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成就。

而马步芳能够做出上述业绩，关键在于他大办昆仑中学。通过昆仑中学透视到的青海地方社会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在由以马步芳为首的青海地方势力主导下的青海社会中具有当时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几乎全部分形特征。这种结构分形在青海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中又具有其运行的独立特征。如果我们把马步芳视为主导青海民国时代的具体行动者，把昆仑中学视为这个行动者行动的部分舞台，以此为基础来分析青海这个分形结构的特征和运作机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在民国时期所经历的具体历史进程。

昆仑中学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通过举办这所学校，马步芳成功地解决了维持以他为首的青海地方势力统治力量的两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重大问题是在转变人口的内部结构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转型。昆仑中学的举办首先改变了回族社会对待以汉语文进行的新式教育的态度，同时，通过大量培养和训练学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为青海地方当局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扩张造就了重要的人口基础。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牢牢把握住了这种人口培育的方向，实现了青海地方社会意识形态的整合。由于昆仑系的垄断性影响，其它的教育系列在青海边缘化



了，由于“反共救国”，在“护教护乡”的旗号下整合了青海的各宗教、各族群和各阶级，在“保卫祖国”的旗帜下升华了本来以青海地方意识为核心的“昆仑话语”，使得青海人有一种共同的自我认识和表达。这方面产生的强大精神力量，支持马步芳进军陇东，也支持了那些昆仑中学培养出来的“忠诚战士”在马步芳大势已去依然上去陪葬，直至1958年。

从马步芳举办昆仑中学的动机、具体的举措、采用的话语方式以及青海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政府、马步芳和马继援个人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关系来看，在解决上述两大问题的时候，马步芳实际上处理了三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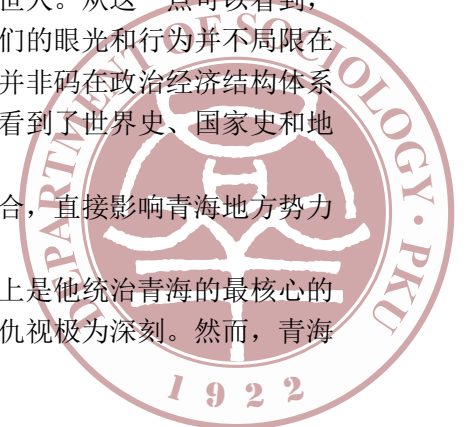
第一种关系对于马步芳的权力来讲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宗教与军政权力的关系。马步芳出身穆斯林，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的基本队伍和忠实干将以回民为基础，他统治青海的依靠是青海当地以及周边回民社会的支持，要得到认可和支持必须维护宗教。但是，伊斯兰教是一种强调政教合一的宗教，干预军政、控制军政权力是多数宗教派别的内在属性，加之甘青地区伊斯兰教教派门宦林立，严重分散和消耗社会资源，从西北回族军阀产生之日起，他们就处在与宗教的这种矛盾关系中。马步芳的父亲选择了最适合当时回民社会克服这种矛盾需要的伊赫瓦尼，首先在推进教育方面得到了宗教的助益。而到马步芳主政的时候，他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职业者提出了很高的道德和阿林要求，并且严格约束他们不得干预地方军政诉讼（马步芳，民国三十五年）。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到，马步芳处理的实际上就是使传统部族社会的臣民和教民转向某种程度的现代人的问题，当然，他正在建构的社会远不是公民社会。

在青海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宗教与政权之间的冲突，这也一直是马步芳治理青海比较失败的地方，即藏族社会普遍信仰的喇嘛教体制与青海地方势力想要快速推进的现代行政体系之间的冲突。马步芳势力竭力向藏族部落地区推进现代行政制度和管理办法，最主要的动力是为了收税和垄断贸易，而在这种动机下，政府不可能让全体藏族部落社会认同现代行政体制。双方在一些事件上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体系与民国时期青海地方当局推行的行政体系之间的冲突。民国时期出现在青海的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注意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已经纳入和尚未纳入、深度融入和表层相关的各个群体分别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青海民国史同时也是各族群多重社会历史进程的纠结史。

马步芳需要小心处理的第二种关系也是生死攸关的，那就是青海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从马麒开始，无论是马步芳的家族势力，还是青海的地方势力，从始至终都没有过丝毫反对中华民族认同、否认中央统辖地方合法性的企图。甚至相反，他们把自己统治一方的合法基础牢固地建立在对中华民族的忠诚和至少在形式上对民国中央政府的服从上。这样一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就转成他们在需要维护自己割据一方的实际利益时，如何在其中拿捏分寸、保持平衡的协调问题。也正是他们的那些具体的“拿捏”和“平衡”作法，使我们看到地方作为能动者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积极参与。在这个问题上，马氏父子做足了他们广交蒙藏、老于边事的文章，成为国民政府主政时期应对来自英、苏等外部力量对我西藏、新疆分裂图谋的主要力量。他们以传统帝国大一统的政治道德理念为行为指针，巧借国际风云，在维护大一统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和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每一步都在合法性上做得可以大书特书以飨世人。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中华体系内部的地方力量，在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博弈的时候，他们的眼光和行为并不局限在体系内部，而是在世界与国家之间以国家利益为轴心拓展局面。地方并非码在政治经济结构体系中的一块积木，他们同样是参与和制造时局的能动者。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史、国家史和地方史的纠结。

在主政过程中，马步芳处理的第三种关系事关青海地方社会的整合，直接影响青海地方势力的实力。这就是青海的族群关系。

对于马步芳来说，第一对棘手的族群关系就是回汉关系，这实际上是他统治青海的最核心的要害问题。青海历史上就是回汉冲突的重灾区，民间回汉之间的相互仇视极为深刻。然而，青海



的兵员、财税主要来源于河谷农业区，农业区人口中汉族占多数，如果不能处理好回汉关系，马步芳家族将无法在青海立足。这种关系也将马步芳置于矛盾境地，他必须在分配各种地方资源的时候掌握平衡，偏向哪一方过甚，都将使另一方背离。

马步芳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采取了以社会阶层为基础的“分而治之”策略，主要从相互尊重文化和维护精英利益方面着手。他一方面给青海的地方名士以很高的地位，保护西宁城区的汉族商户和河湟谷地大地主，让一般汉族子弟也一样可以通过昆仑中学和保送大学的途径有机会飞黄腾达。另一方面，他强化回民教育促进会，建立教育系统，开办昆仑中学，全面提高回民素质；同时又从当地汉族地主手中收购荒弃的滩地旱地，调动军队平整开荒，兴修数套灌溉系统，以安置那些生产条件极差的回族农民；并严厉惩治以信教等借口反对汉民或不尊重汉民的人等等。正是通过了以上一系列措施，青海的回汉关系在马步芳时代有了很大好转，尤其是基层汉族社会的上层和西宁市的工商业者，还是比较拥护马步芳统治的。如果说马麒拢络了青海地方汉族社会贤达，那么马步芳则全面协调了回、汉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这也许就是李文实先生所提的“群众关系”和“广泛而坚实的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马步芳的动机如何，他的这些作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社会对于地方行政当局的功能需求。

马步芳父子对蒙藏的态度，在前文所引李文实先生的文章中已有所述及。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政教关系的纠结，使得民国时期青海地方内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对待藏族部落的残酷镇压上，这是马步芳时代青海族群关系的败笔。对藏族部落的惨绝人寰的屠杀至今还是藏族群体记忆中没有经过充分治疗的创伤，依然在产生着重大社会影响。由于马步芳的回族身份，当时的冲突在今天还被一些人认为是“回藏关系”问题，这是我们理解当今回藏关系所不可忽视的历史因素。

从笔者已经完成的口述史调查资料来看，亲历者们并没有赋予这些事件如此复杂的解释。概括起来，问题似乎很简单，服从“大局”、顺应“时务”的人们平安无事，“不识大体”、“一意孤行”，甚或是想骑在墙头、左右逢源、惹事生非、从中渔利者，必当重惩。这样，他也切实笼络并获得了相当部分藏族首领的支持。所以马家军对部分藏族部落的打压，并不是回藏冲突，也根本不是“民族问题”。这里让人看到的是传统部族社会中“臣服与奖赏”、“叛逆与惩罚”的规则，是典型的古代帝王将相的行为。而与之相对的事件另一方的藏族部落，其行为则遵循了高原游牧社会的部落政治模式，在游移中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青海地方社会的族群经历着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同一个地方统治集团既有倾向于现代的政绩，也有承袭于古代的规矩。在民国时期，青海地方社会政治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青海的民国史也为我们呈现出了趋向现代的新型政治行为与传统的权力关系模式的纠结。

总体来讲，以马步芳为首的青海地方当局对上述三种关系基本上处理得比较得体，理顺了关系，所以他们才能把在青海的统治根系深植于青海地方社会，枝叶紧紧缠绕在国家体系中，在动荡的民国时期独据青海四十年。正如鲍大可评价的，昆仑中学是青海省最有影响的发展，正是借助昆仑中学这个平台，马步芳才使青海地方各种诉求和各种矛盾融合成为一个共同的进程中，把人们置于共同的社会历史命运之中。

马步芳处理上述三种关系的方式、各族群在互动过程中借助的力量和合法性基础，以及人们在对待自己、外部以及国家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和行动，直接涉及了五个核心议题。

议题一、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和机制、人口的社会结构和人的内部结构的转变。

在青海就是汉、回、蒙、藏四个主要的族群社会的不同进程以及他们之间如何协同的问题。在那个时代，虽然因为马步芳出身于回族，回族在社会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但青海仍然是汉、回、蒙、藏等族共治的社会。这一点为我们深入检视中华体系的族群性在民国时期的青海社会历史过程中的表现，并分析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动因提供了机会。而所谓的族群关系，在青海民国史的研究中，更恰当的定位可能是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文化结构和人口的内部结构的变化。

议题二、中国社会政治体系的演变过程、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



青海的民国时期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历史境况：地方社会在更宏观的社会的“大事件”一波又一波的振荡中，一直在做着自己的事情，走着自己的路。只要符合它的需要和目标，它就会采用大历史的方式、从大社会中谋取资源，因而将自己与大社会“捆绑”在一起，以卷入或者融汇的方式进入大历史的进程中去。“历史不仅是由行动与经历的关系组成，而且是由影响与功能的关系组成。这些关系能压过个别人的追求与努力，而个人主观上并不一定认识到这些关联的存在（科卡，2006：78）。”马家军阀在青海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历史经验是：传统意义上的“功业”，只有在充分适应历史的条件下，在国家层面获得了某种文化象征图式或社会结构意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被成就；地方和族群必须要处在国家的战略层次上思考问题才能在国家进程中借其势受其益。这实际上是在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央的国家权力和权威如何演变为地方性的威权？一旦这种外来建构的权力获得了它的行为主体，这些行动者将如何建构自己的合法性？

议题三、不同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相互影响和协同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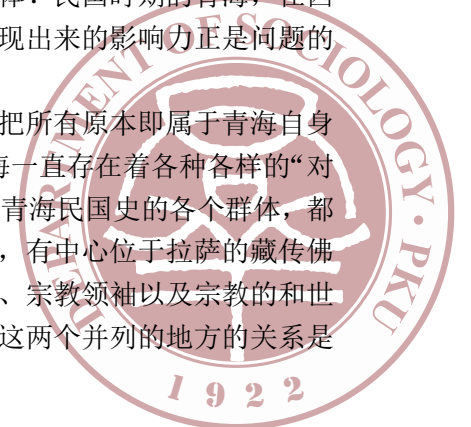
青海地方的各族群，汇聚了多种文明的交互影响。马步芳所处理的宗教与军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现代政治文明与传统部落社会和具有中世纪色彩的宗教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代也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马步芳处理伊斯兰教与现代军政体系关系的尝试无疑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来自本土的历史案例。另外一个需要在不同文明的框架里加以理解的问题是，在青海地方的汉族社会传统信仰、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是如何形成了一种互动共生关系。在与西方现代基督教文明接触以前，中国社会中发生的文明之间的交互主要涉及这三者，这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文明关系问题，只有在青海这三者才深刻地交汇在一起，并影响整个地方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性。马家父子作为虔诚的穆斯林，能以地方统领的身份按照蒙古人的方式“祭海”、能按照藏族的礼仪和心意供奉活佛、能为汉族修建寺庙道观；“马家军”中不少人精通藏语，善交藏民；青海地方统治集团中回汉蒙藏共处，各取所长、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我们探讨中华传统体系中不同文明和意识形态和谐共处、协同演变的案例。这些案例与当代对照，是理解、评价以我们已经经历过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所形成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重要参照。

议题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部机制、演变过程和现实结构。

分析甘肃陇南势力何以主持青海河湟地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帝国体系中华夏中心与各种边缘关系模式的内在机制。以马家父子为首的青海地方势力的作为，在时间上又是这一地区“现代”的开端。在这种时空条件下观察马家动作，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部机制、演变过程和现实结构。

民国时期，无论相对于其前中华帝国强盛时期的皇恩浩荡感服四方来说，还是相对于之后人民共和的民族-国家社会控制能力而言，都是中央法统和威权衰微的时代。列强面对这个庞大传统帝国的躯体，或工于谋略，经心分化瓦解之，或明火执仗，暴力抢夺吞并之，但终未能得逞。这不禁让人发问，是什么力量在进入现代转型期以后依然维护着帝国臣民对民族-国家的向心力？是什么机制保障了如此复杂多元的中华民族在四面楚歌中依然固为一体？民国时期的青海，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的作为，就全面展示了这种机制，其中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影响力正是问题的答案所在。

以马步芳为首的地方当局可以专权青海，但是，这个集团并没有把所有原本即属于青海自身的组成部分和涉入青海地方割据的外部力量纳入有效控制之中，在青海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对立面”。在人们追求现实利益和自主性、躲避强势盘剥的过程中，涉入青海民国史的各个群体，都在从各自的社会文化系统关联中寻找资源。其中最吸引笔者关注的是，有中心位于拉萨的藏传佛教政教体系作为依靠的青海藏族社会精英的活动，包括藏族部落首领、宗教领袖以及宗教的和世俗的知识分子。概略地了解他们在民国时期的活动，笔者感到，青藏这两个并列的地方的关系是



介入青海地方史的不应忽视的因素。而当其中一方处于强势，对另一方及其所护佑的群体造成难以承受的伤害时，处于弱势的一方，在青海民国史中也就是卷入事件的“藏”方，总是通过向上寻求“中央”的裁决和保护才得以解脱，求得西藏当地即有格局的维持。这说明，在地方具有一定的历史主体地位的时候，“中央”是居于上方的地方关系的调节者。这是否揭示着一种具体的“多元一体”的关系格局？

民国作为中华现代国体之始，历时仅 37 年，即被人民共和国所取代，这是国共两党相争的结果。美籍华人学者徐中约分析认为，国共之争，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在确立了走向现代共和政体之后，要解决国家机器的正当性和国家利益的所有者和受惠者的问题，因此，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因而民心所向的中国共产党取胜是历史的必然（徐中约，2008）。在中华体系的长时段视野中，这也是一次全局层次的“主政”与“在野”两方面的相争，一方面要维护法统苟延残喘，另一方面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社会。

现代逐鹿中原的历史，映射在青海地方，呈现出两个层面的后果：首先是国民党主政时期的“英雄”在新社会被判为“恶魔”，地方政府推行的所谓“进步历程”被定性为“落后的封建割据”。而在地方政权的基本性质在政治层面被确定之后，就把该政权执政时期的所有作为和当时处于“主流”的价值观念等统统予以否定，把当初由“恶魔”出面竭力维持的“法统”统统打倒，其中包括延续千年的地方群体互动规则和认同体系。

在当地的口述史调查中笔者感到，现实社会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刺激使得各族群的一般人选择了不同的历史记忆，国家官方话语当中对青海民国史的叙述，在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汉族老人中，一般只保留作为农民群体的记忆，他们大多回避本群体在地方史中曾经扮演过的“不光彩”角色，而以“需要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农民集体记忆来“抹煞”“历史协同犯”的嫌疑。回族，作为没有逃避可能的所谓地方史的“主人”，几乎只记忆精英“英雄”的经历，而不谈“善恶”，以过去的“辉煌”作为现代的导向，期冀通过努力来争回“主人”的位置，而近在五十年前的“农民翻身得解放”，在许多回族老人的记忆中都在被淡化甚至遗忘。藏族老人，几乎只记忆受迫害的经历而不去分析其中的原委，人们在受害者——需要解放的人——拥有优越性——特权正当性——追求某种超越性的权益五个方面建立起牢固的逻辑链，在受害者心态的驱使下强化一种背离内部社会历史关联、期冀彻底的外部解放的心理情感。而各方也具有明显的共同点：一是对新近的文革“历史”都在极力“遗忘”，仿佛文革时期的一切都是在人们被“催眠”的状态下发生的与己无关的事情；二是对于遥远的过去，人们的历史建构是极力淡化族群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互构历史，以强调各群体“历史”的“独立”和“独特”来强化今天的“民族”边界，而这种“民族”新建构又是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民族”定义和“民族政策”所启发和强化出来的。

问题是，在青海的近代史中，有没有单纯的加害者与受害者？抑或是大家都遵循社会整体的权力逻辑和各族群自己的实践理由来相互施害？在这样的过程中，各自从自己的角度看，“大家”会得出表面一致却实质相反的结论：“我们都是正义的”，而“我们”分别在事件中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现实社会的思维逻辑是，大家都在用过去的逻辑原谅历史中的自己，用当代的判断谴责历史中的别人。各方没有一套超越具体群体利益的参照、价值和关怀，永远没有客观的是非。在大家都还没有学会把自己的价值和利益相对化并融汇到一个更大的能够包容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历史框架中以前，在历史中受虐的孩子永远也不会当下长大成人。社会以它的现实逻辑呈现矛盾，而要从矛盾中解脱出来，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关于社会现实逻辑的话语方式，而要改变它，就必须看到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和它的结构运行机制，使得关于社会和历史以及人们的实践和意义的解释和叙述，尽可能地符合社会运行的状况。

议题五、如何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当前的历史处境。



中国是一个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性潮流中的区域性体系。她在近代以来所经历的一切，几乎都与这种被动的态势局面息息相关，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可能脱离世界史而单独加以研究。在我们对青海民国史的简要勾勒中已经可以看到，研究地方史，同样不能脱离世界史和国家史而将地方孤立于它所身处期间的世界，用另一种“割据”阐释割据。这样一来，要恰如其分地为青海民国史的研究定位，就必然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或者说是中华体系的近现代历史以及当前的历史处境的问题。

国家的历史，从其内部看，具有整体性，并且表现为一种“普遍化”的进程；而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国家史在全球性的历史进程中又是一部具体的地方史。地方社会的历史也是这样。它本身具有整体性，但又在各个方面与更高层次的各种因素相互关联。之所以不能跨越国家史而把地方史直接置于世界史之中，主要基于三点理由：第一，在对地方进程的影响力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国家进程的影响要大于世界史进程的影响，并且来得更为直接。例如，20世纪中叶在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区域内出现的创建民族国家的世界历史进程，在我国西藏的影响无法战胜中国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即使在中央政府极其虚弱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机制仍然能将青海地方势力推到历史前台承担本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第二，世界历史进程影响的传递必须经过既存的社会结构。例如，青海以它自己的方式经历了抗日战争，但日本却从来没有称地点名地向青海宣战。这也同时提示我们反思，不论与中华体系交汇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关系结构具有多么强势的影响，也无论列强如何处心积虑想要拆分中华，在它进入中华体系的时候，它必须注意到其整体性，甚至只能以整体来对待之。第三，青海民国史呈现出的多重纠结，使得对它的研究需要一系列的跨越层次的事件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要求一致的分析单位，世界史的传主是民族国家，越宏观、越具有普遍性的比较原型，越具有“理想型”的性质，要寻找用来比较的指示性指标及其影响因素，只能首先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进行，然后在经验世界的不断深入中加以修正。

沃勒斯坦在他的世界体系理论里提到三种体系，即“小体系”、“世界帝国”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传统中国被称为“世界性的帝国”。“‘世界帝国’是庞大的政治结构，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类型。该体系的基本逻辑是从其它地方自我管理的直接生产者那里抽取赋税，并上送到中央，然后在少数酷吏中进行再分配”（沃勒斯坦，2008：288）。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逻辑不能排除沃氏提到的三种体系中的任何一种，更远远不能用这三种体系中的任何一种来加以概括。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通行的“民族国家”分析框架可能不能应对分析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需要。

中国的历史现实是，她不得不屈就自己，让自己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里通过这个体系的内在逻辑变得“进步”而重回野蛮。从文明史和国家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分析的进程，也许是一种传统帝国体系经由部族主义的族群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过渡。青海的民国史，可能处于这种过渡的前期，而人民共和国时代则接近这种过渡的后期。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作为历史能动者的“地方”势力已经不复存在了，与之对应的是，来自远方和上位的力量也已不能继续扮演调节者的角色，上方的存在实际上演化为强力控制的力量，亦即几乎等同于传统关系模式中强势地方势力的角色。当传统中华体系的关系架构屈尊俯就落到民族-国家的窠臼之中后，按照民族-国家的行为逻辑处理传统帝国内部的族群事务，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

三、研究中的难题

青海民国史，是青海的现代史的一个段落，其中蕴涵了多元多重历史进程的复杂的纵横交错，人们和社会的面貌已经和正在这交错中改变。在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青海的民国时代是段比



较微观的进程。但是，正因为关系到上述三大关系和五个核心问题，对于青海民国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实际上是一个重大题目的开始，也许我们能够通过这一局部的细小分形窥见全貌。

青海地方的历史，居于一种中间环节或曰层面，通过一系列特定的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世界、国家历史的影响汇入地方进程（或者说将地方卷入其中）；个人的命运和群体的变迁被裹挟进地方层面的历史进程。

各种各样的路径，以及由这些路径出发而看到的青海民国史研究的学术定位，是否存在一种逻辑框架，从而可能为理解中国社会体系提供某种理论模式呢？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青海民国史研究的应有抱负，不如说是它必须解决的难题。

1. 纠结史的整体性难题。纠结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重现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倘若不能很好地体现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整体性理解，无疑仍会重复已有的一些历史研究的缺陷，在强调整体性的同时依然在分割着社会系统。本文参考的李文实先生对青海民国史的分析，采用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传统整体性时局认知方式。当我们试图以这种方式与当代社会研究领域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对话，抑或是话语转换的时候，发现中华体系的思维方式将天文地理、人虫鬼神统合在一起，以“西方”学科话语梳理之，几乎要涵盖上至“天文社会学”，下至微观个体行为学的全部知识，甚至还难以完全对应。要完成一部中华体系的地方断代史，即需要应对这种研究对象本身提出的对方法论的全面挑战。

2. 社会史和英雄史、国家史和地方史、政治史和心性史等等，各种历史视角的选择难题。本文关于青海民国史进入路径的初步讨论，基本上以马步芳及其父祖为中心，历史观察的视角实际上是“英雄史”的。这种切入历史的方法本身既提供了纠结史分析的基础，又与纠结史的整体论要求相矛盾。能否找到一个具有足够的关联维度和深度的切入点，并且以此出发，有效地展现社会历史的整体性，也许是克服单一历史视角所造成的局限性的有效方法。笔者对马步芳治青的最重要的举措昆仑中学进行了初步的专题研究，认为它基本符合纠结史研究介入的条件要求，确是一个值得下功夫深挖的题目。但在梳理昆仑中学这个机构的“生命史”的过程中，笔者感到从整体框架来看，很难突破国家史的限制，真正进入“地方史”。而在有关社会史、相关群体具体进程、个人生命史以及地方心性史等方面的材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很难判断这种状况究竟是研究方法的问题还是对象本身的特征。

3. 多元社会的“进出”的难度。要整体把握青海民国史，需要研究者超然。但要探索这部纠结史的究竟，又需要研究者深入涉入其间的各种社会内部，以复数的“主位”视角判断事件的影响，从而展开比较。在青海的民国史中，有效的比较研究至少涉及回汉蒙藏4个族群群体。一般来说，较为容易的是“出入”当地回汉社会，而难度相当大的是“进出”蒙藏社会。本文一直未涉及民国时代青海蒙古盟旗，因为在笔者能力所及的有限阅读范围内，关于青海蒙古的记叙大多出自缺少真正地方性知识的青海蒙古的局外人，或者虽具有“本地”身份但却没有亲历地方性社会实践的人，无法从中找到对于“进入”蒙古有所助益的信息。如果要在方法论意义上真正解决对于青海蒙藏社会的“进出”问题，笔者的语言条件和知识积累是难以胜任的，这项任务只能由生活在蒙藏社会中的“局外人”来完成。

4. 历史与现实互涉造成的难题。在青海的民国时代，蒙藏的地位至少是对等的。但是在今天的文献中，它们却处于极不相称的状态。这是现实的民族关系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结果。这无疑增加了以整体视角进行研究的难度。更大的难题之一是当代社会中的“民族”话语与历史情境中的“族群”关联的冲突。“民族”，是一个外来概念。这个概念在进入社会的一开始，实际上是人们用以表述既存关系格局的一种新的话语词汇而已，并不具有这个词在其孕生的母语环境中所具有的含义和上下文。人们借来这个词，直接将其加入社会语境之中。所以，当时社会中对这个词的含义，必须放在当时的语境和意义互动中加以理解，以求准确把握。但是，今天的人们在



追述自己亲历的历史的时候，已经完全浸润在当下的“民族”话语之中，笔者只有在对一些地道的“下里巴人”或“文盲”的访谈中，才能找到没有“民族”话语“污染”的感觉。这又把有关青海地方史的研究更深度地搅入精英史与大众史协调的难题之中。

5. 各种各样的人对各种事件的经验直觉与史实证据协调的难题。人最特殊的能力在于反思。当人们回顾经历过的事情的时候，一般都会有反思性评价，甚至是对事件的重组。在人们的反思性叙述中，曾经有过的进程无疑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面貌。能否在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中接近历史的“真实”，从而提炼出可作为“史实证据”用来分析过去的社会的资料，是纠结史研究能否在方法上经得起推敲的关键。

纠结史研究本身即纠结着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方法，而研究者在这种实践中，也处于全面、深度的“卷入”状态。套用佛教社会学的话语来说，纠结史的研究就是“心镜”与“实像”、“我心”与“实证”的纠结、呈现和反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的知识既是“法印”又是“智慧障”。

参考文献：

- 鲍大可，（1993）1998年，《中国西部四十年》，孙英春、门洪华、张立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 陈秉渊，2007年，《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1999年，《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第901—911页。
- 范长江，1937年，《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天津大公报馆。
- 费正清、费维恺编，1993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2003年，《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资料》，北京：民族出版社。
- 科卡·于尔根，2006年，《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文实，1986，“马氏家族长期统治青海的原因试测”，见青海省政协办公厅1986年9月刊印《西北五省区政协第五次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会刊》，第118-124页。
- 马步芳，《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香公委员长对改革阿文学校指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编，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青海省图书馆地方部馆藏资料。
- 马宣道，1984年，“我所知道的白崇禧与马步芳”。见《西宁市文史资料》第一辑第57-67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宁市委员会编，西宁（内部资料）。
- 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2001年，“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形成及覆灭”。见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集萃（军事卷）》第1-65页（内部资料）。
- 青海省统计局，1998年，《青海统计年鉴》（199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王明柯，2008，《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沃勒斯坦，2008年，《否思社会科学》，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三联书店。
-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1993年，《西北五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谢和耐，2006年，《中国社会史》，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 许宪隆，2001，《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 徐中约，2008年，《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六版），计秋枫、朱庆葆、茅家琦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363—491页。
- 杨效，1986年，《马步芳家族的兴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